问道古今

城市需要养育，也需要书写

对话人：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雪梅　阮可欣（本报记者）

开栏的话

文化遗产从历史深处走来，沉淀为我们今日的文化底色，也赋予我们走向未来的底气与方向。本版新开“问道古今”栏目，邀请专家、学者对谈，辨源流、析肌理、探价值，以对话追问来路，以思考回应时代，让绵延的文脉接续生长。



广东潮州古城。　樊功厚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重视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展开。主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以《看得见的文化遗产与看不见的历史记忆》为题，表达对城市文脉传承的关注。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本报记者对话陈平原，探讨城市文脉如何在人们的日常中传承。

保护城市历史文脉是一种历史责任

记者：文人关于故乡的书写、关于城市的书写有着悠远的文学传统，也是城市文脉的重要组成。2001年起，您在北大开设相关课程，引领学生们“阅读城市”，从“重写文学史”转向“重建城市文脉与历史记忆”，这样的延伸与扩展对于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平原：作为中文系教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主要专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建构，以及如何“重写文学史”。进入新世纪，方才关心“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我看来，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及写作，注重以宫阙或乡村为主要场景的感时与忧国，以及以山水或田园为主要场景的隐逸与超越，相对忽略了以市井或街巷为主要场景的现世与欲望。因此，很想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对古往今来“这一个”城市的论述。于是，有了“‘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中那段话：“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香港和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

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程，其得失利弊，需要认真辨析，专家学者有义务为“重建城市文脉与历史记忆”做力所能及的事。虽然晓得我那些近乎杂感的文字，不见得真能发挥作用，但还是乐此不疲。

记者：您的家乡潮州现在火出了圈儿。我们知道，上世纪80年代经济大潮兴起时，潮州选择了在城外另谋发展，因此古城内部的格局保留了下来。这和城市化早期一些城市的旧城改造、大拆大建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天的城市更新中提倡“绣花功夫”“微循环”来保护空间肌理、历史风貌、文化生态，这些变化您在城市行走中体会很深吧？

陈平原：我之所以写文章表扬潮州保存古城格局，在城外另谋发展的思路，是充分理解“当领导的，建设新城容易，守护古城很难”。其中牵涉领导干部的考核、投资的回报需求，以及百姓迅速提升生活水准的强烈愿望。所有这些，不是很容易协调的。直到今天，潮州的经济指标也都不理想，这里有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但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微改造，不迁原住居民，保留烟火气，可能也是重要原因。

这些年，潮州确实火了，那座好不容易保下来的古城，迎来八方游客，节假日更是人潮汹涌，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那是因为，旅游业是惠民工程，主要作用在促就业，保民生，而不是增加GDP。因此，城市更新中，保护古城风貌，改良文化生态，主要着眼点不是经济指标，而是历史责任，即如何为子孙后代预留社会转型及文化更新的可能性。

城市发展须讲究“顺势而为”

记者：您提到已经消失了的古建，不宜重造，如何理解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真实性”？

陈平原：前些年的城市建设热潮中，我们曾因交通、城建、经济等考量，拆了若干精美的古建筑，现在看来后悔莫及。问题在于，当初没能保下来，很可惜，但并不意味着有必要恢复重建。以今天的经济实力及工艺水平，短时间内建成若干高低错落、流光溢彩的仿古建筑，一点都不难。但并非所有人都有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清“真迹”与“赝品”的。博物馆里的复制品之所以必须特别注明、古代器物修复时之所以保留残缺，以及旧城改造之所以强调“修旧如旧”，都是为了凸显“真实性”。

记者：在“建设城市”“经营城市”“打造城市”之外，您曾提出“养育城市”的概念。如何理解这一概念？

陈平原：从相对平实的“建设城市”，转为“经营城市”，再到“打造城市”，这些概念的变化，表面上是一个动词的选择，背后却是一整套城市发展思路的置换。之所以主张采用春风化雨的“养育”，因为在我看来，人需要养育，城也需要养育——包括体贴、呵护与扶持。这是人文学者跟工程师或经济学家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希望凸显这么一种思路：城市本身有其生命，值得你我尊重，城市发展须讲究“顺势而为”。首先理解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而后才谈发展和未来。还有，就像对待孩子一样，有所期待，但不拔苗助长。给城市成长的时间和空间，随时观察，并不断修正期待。

讲好中国的城市故事

记者：您曾说有好作家的城市，真的是“有福”，因为可以写出城市的气质。同时您也注意到过去城市的代言人是诗词曲赋、是文学家，现在则可能是音乐、歌曲、影视剧等新的载体。您如何看待各地出现的“为了……奔赴一座城”的网红模式？

陈平原：称有好作家的城市“有福”，那是因为，关于城市的前世今生，七情六欲，还有潜藏的欲望以及积累的潜能，往往只有作家能敏感到并将其准确表述出来，这需要直觉，需要想象力，以及很好的表达方式。当然，今天“作家”的定位以及“文学”的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更恰当的表述，或许叫“书写”或“呈现”，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影像或声音；可以是虚构，也可以是写实；可以是文艺，也可以是学术。在我看来，与其关心那些很可能昙花一现的“网红打卡”，不如注重这些若隐若现的“文学地图”。

今天中国，凡文化底蕴稍为深厚的城市，都有很不错的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但不见得都有兼及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城市建筑以及风土人情的文学馆。拿北京来说，位于朝阳区芍药居文学馆路45号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固然规模宏大，但其关注点是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不是首都北京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大都市应该另建一座类似“上海文学馆”那样集收藏、展览、阅读、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

记者：当下各级各类博物馆发展快速，博物馆如何更好地成为勾连“看得见的文化遗产”与“看不见的历史记忆”的场所？您曾说城市建设一个博物馆容易，但培养公民走进博物馆的习惯、涵养对好的展览的鉴赏不易。对现在的博物馆热、建设博物馆之城，您有什么新感受？

陈平原：博物馆建筑与作为收藏、展览、研究三合一的博物馆文化，二者并不同步。多年前我曾感叹：博物馆的建筑比藏品好，藏品比展览强，展览比观众优。最应该用力的，是如何提高公众进博物馆参观的愿望，以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好在最近这些年，民众观看博物馆的热情明显提升，各省市大型博物馆的常设展也都人头攒动。但我注意到一点，公众的目光过多集中在明星博物馆，导致好多藏品别具一格、展览很有特色的博物馆“养在深闺人未识”。

记者：在您看来，讲好中国的城市故事，寻找、阐释乃至重建城市文脉，文人、学者、民众可以贡献哪些力量？您倡导更多的人给自己的城市写一本城市读本，您觉得好的城市读本是什么样的？

陈平原：多年以前，我说过，某种意义上，城市是建起来的，也是“说”出来的——尤其是城市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内涵，即内在的力度与美感，需要人文学者帮助发掘，才能被公众所接纳。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摩天大楼不再是国人孜孜以求的关键指标，城市更新与文脉接续成了主战场，这个时候，人文学者的关怀、学养与趣味，终于有更大发挥的空间。用什么办法，能让中外学界深耕多年的研究成果，被普通读者欣然接受，我以为编写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城市读本”，是个好办法。正如我在这届北京文化论坛主论坛发言的结尾所谈到的，“真希望有更多兼擅文采、学问、读者趣味与市场眼光的大专家，愿意俯下身来，撰写此等在学院评价中不算分数的通俗读物。单就保存历史记忆、塑造城市形象而言，此类图书比严肃的政策宣导或活泼的文旅推介更有效，也更长久。”

漫游荆楚大遗址

张　炎

现代人如何获得穿越时空的体验？遗址公园给出了答案。

湖北“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近日入选2026北京文化论坛集中发布的重要成果。全省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8处省级文化遗址公园，正在成为古今对话的公共空间。不妨选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走进遗址公园，重返历史现场。

一把考古手铲，层层拨开尘土，揭开了“何以荆楚”的面纱，串联起长江中游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学堂梁子遗址“郧县人”头骨化石揭示百万年人类演化的踪迹；屈家岭遗址记录5000年前长江中游的农耕文明；盘龙城遗址彰显商代南方中心城邑的辉煌荣光……几代考古人深耕荆楚沃土，累累硕果成为遗址公园最坚实的学术支撑。

走进遗址博物馆，聆听文物的无声诉说。屈家岭薄如蛋壳的彩陶杯、代表农耕文明的炭化稻谷，石家河温润灵动的玉团凤、肃穆庄严的玉神人头像，铜绿山见证千年采冶史的大铜斧、鼓风冶铜竖炉……依托精细展陈设计与体感交互、全息投影等数字科技，这些跨越千年的文物，生动铺展开荆楚先民的生活图景与精神世界。

遗址公园最动人的风景，在遗址展示区。这里是馆藏文物的原生地，是历史真实发生的现场。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四方塘墓葬展示区，展示国内罕见的先秦矿冶生产者公共墓地，让今人触摸到采矿冶铜先民鲜活的生命痕迹。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1号车马坑实施原址原状保护展示，130余米的真车真马遗迹，直观再现楚国“千乘之国”的赫赫威仪。明楚王墓考古遗址公园开放展示的昭王、愍王茔园，清晰呈现明代藩王陵寝的严谨规制与空间格局。

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给土遗址保护带来天然挑战。盘龙城创新采用改性土包土夯筑工艺，研发出具有优异耐腐蚀性和耐候性的玻璃纤维增强混凝土，结合3D打印技术与非遗泥塑工艺，让宫城区生动地展现在游客面前。依托系统性文物保护工程，通过原址展示、模拟展示、标识阐释等多元手段，残缺的遗址重焕生机，沉寂的历史照进当下。

如果仍觉意犹未尽，丰富的视听作品与品牌活动可尽览荆楚遗址风华。《“郧县人”3号出土记》《长江天际流　荆楚百万年》《石家河》等纪录片，全景展现荆楚文化的源远流长。“超级文旅日　文物说荆楚”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专家深入浅出导览解读，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文博盛宴，让厚重遗产可看、可听、可感。

遗址公园可游可观，更可亲身体验。盘龙城“小小考古人考古盘龙城”、屈家岭“金色农谷研学”、铜绿山四方塘研学工坊，打造了多种特色研学课程。游客可在模拟探方中体验考古发掘，亲手拓印青铜纹饰、复刻史前陶器，参与矿石分选、模拟古矿井支护搭建，在动手操作中读懂先民智慧。形态丰富的文创产品，萃取文物纹饰、遗址符号，化作帆布包、冰箱贴、艺术饰品等好物，让遗址记忆可随身携带、长久留存。移步剧场，铜绿山博物馆戏剧《因为青铜》、石家河数字考古实景剧《看见石家河》，再现千年矿冶文明与史前古国气象，让人在光影演绎中与古老文明相逢。

遗址公园的价值，更在于滋养民生、赋能城乡发展。在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你也许会发现与你闲谈的工作人员就是当地居民。在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你会遇见在公园里打太极拳的村民。襄阳依托凤凰咀遗址保护，带动闫营村蝶变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荆州以楚纪南故城等重要遗址为核心，打造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赋能城市文旅升级；潜江龙湾遗址旁，虾稻连片、碧水环绕，千年楚囿文脉与当代水乡产业共生，绘就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和美画卷。

散落于荆楚大地的遗址公园，是铺展在山河之间的立体史书，是溯源荆楚文脉、长江文明的重要窗口。古代先民曾在此栖居劳作、创造文明，如今山河依旧、文脉绵延。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局）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宫城区展示。　张　炎供图

文化遗产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赵偲汝　阮可欣

辽上京的十年

周飞亚

“老师带领我们进行精细化发掘、关键性解剖，在保护晚期遗迹的同时又厘清了早期遗迹的平面布局和营建次序。这不仅是技术和方法，更是对历史最温柔的尊重。”

9月21日，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正在举行。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包桂红怀着激动的心情，代表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的第十届学员，发表结业感言。

2017年，由国家文物局委托和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依托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工地开办了城市考古高级研修班。如今，研修班已连续举办十年、培训了百余名学员。他们如一粒粒种子，带着城市考古的新方法、新理念，在全国各省市的大遗址工地落地、发芽。

从二里头到殷墟，从长安到洛阳，从邺城到开封……中国古代都城遗址数量众多，其中不乏知名度更高、历史文化积淀更深厚、发掘时间更长的城址。为什么是辽上京？

故事要从15年前讲起。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开始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系统的科学发掘。

中国古代城址，大多是多朝沿用，所谓“十朝都会”“六朝古都”由此产生。有的城址沿用至今，被称为古今重叠型城址，如北京、南京、西安等；有的城址用了一段时间即废弃，被称为荒野型城址，往往更有利于发掘。辽上京遗址就属于后者，且城址保存较完好。

皇城西门、西山坡佛寺、宫城东门……在时任考古队长董新林的带领下，沉睡多年的辽上京遗址被一点一点揭开神秘的面纱。一套城市考古的新方法、新范式也逐渐成形。在2023年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辽上京皇城南部一号建筑基址考古发掘项目被认为彰显了中国城市考古先进技术与理念，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发掘的典范之一。

研修班的学员们开玩笑说，在这里学到了城市考古的“三大法宝”。

第一个“法宝”是精细化发掘。这听起来并不新鲜，似乎也不难，但在辽上京遗址，精细化被推向了极致，“每一块土是哪个单位的、什么时候的，都要弄清楚”。

“来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老兵’，很快就能学会，真上手了，才发现没那么简单。”已在考古一线工作了20多年的学员张红星感叹，培训扭转了自己很多想法。

第二个“法宝”是关键性解剖发掘。由于多个朝代的遗迹叠压，过去，城市考古一般遵循“见面即停”的策略——即只发掘到最晚期的遗迹现象就停下来，不忍“破坏”上层遗迹。这固然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存晚期遗存信息，却也让人们无法解开更早期建筑营建的历史之谜。

辽上京考古队大胆选择关键节点进行解剖，以最小的发掘面积达成学术目标，既保护了晚期遗迹，又厘清了早期建筑营建次序。这要求解剖地点的选择必须非常精准，如同针灸必须找准穴位。因此，古建知识至关重要。项目伊始，董新林就将有古建知识背景的汪盈引入了考古队。后来，她成为辽上京考古队的第二任队长。

在汪盈看来，城市考古最大的不同在于“系统思维”，“要有全局观”。“一座城，几代人，一辈子”。偌大的遗址，不可能全部发掘，更不能见到遗迹就挖。动手前，一定要有宏观把握。“关键词有两个：一是布局，二是沿革。”

这两个词，深深印在每一名学员心里——在他们看来，这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法宝”。

不仅仅是这些。“多学科的引进、考古项目的管理方式、老师们那种极致敬业的态度，对我来说，都是重要收获。”2021届学员、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黄信如是说。

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员们白天铲土、画图、测绘，晚上听理论课、整理资料、讨论方案……来自不同省份、不同机构的考古人，在这里碰撞思想、交流经验。即便已“毕业”多年，这种交流仍在持续。

为什么是辽上京？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夯土台基里，藏在学员们晒黑的脸上，藏在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中。辽上京遗址不是最耀眼的那个，但它恰好具备了一个理想“试验场”的全部条件：保存完好、层位清晰、问题典型，又恰逢一支愿意奉献、愿意深耕的团队、一个开放的平台。于是，这里成了城市考古新理念的孵化器、青年考古人的练兵场。全国城市考古的格局与生态，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十年，百余人，一座城。故事还在继续。

沿着古道读岭南

曹　劲

岭南多山，岭海相连。千百年前，一声声马蹄踏破五岭的寂静，一条条水道连通山与海。这些1913年以前广东境内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路，统称南粤古驿道。它们曾是军事之路、商旅之路，更是民族迁徙、文化融合之路，承载着岭南从边陲之地融入中华版图的历史记忆。

岁月流转，铁路、公路取代了昔日的古道喧嚣，许多路段湮没于深山荒草之间。与此同时，文化线路遗产保护渐成世界潮流，带动文化交流与地区发展。如何让散落在南粤大地的文化遗产活起来，成为一道时代考题。

2016年起，广东启动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坚持保护优先，保持真实性与完整性，避免建设性破坏。近10年耕耘，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46段、1400多公里的重点线路修复，修缮历史遗存330多处，串联起18个地市，形成“三横四纵”的总体格局。梅关古道、西京古道、潮惠古道等主干线路完成标识系统、驿站服务、生态步道等配套建设，贯穿全省的文化旅游精品线路网络颇具规模。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行走南粤古驿道，如同走进一座没有围墙的岭南文明博物馆：韶关梅关古道“一步跨两省”的石碑，记录着中原与岭南的千年对话；汕头樟林古港的码头遗址，诉说着红头船远渡重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往事。以“古道+生态+文化”的模式，古驿道将散落的历史碎片连缀成文旅珠链，成为“可读、可游、可感”的历史文化空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建人文湾区”，有机整合古驿道网络与三地资源创建的特色旅游线路，正为大湾区建设注入文化动力。更令人欣喜的是，古道复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沿线70%的村落通过“驿道+民宿”“驿道+研学”等途径重焕生机，印证着“以道兴村、以道兴粤”。



梅关古道——关楼。　曹　劲供图

作为对近10年实践的系统总结与学术升华，《南粤古驿道理论研究》丛书今年3月出版。丛书从历史考古、聚落营造到自然生态、文化产业，系统梳理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提炼遗产挖掘、价值认知、顶层设计、保护修复、活化利用、融合发展等经验，为文物主题游径建设和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提供了重要方法示范。丛书编写同样凝聚着广东省“三师”（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专业志愿者的汗水。10年来，他们跋涉山野，指导古道、古桥、老屋的修缮，以专业力量守护千年驿道。

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南粤古驿道理论研究》丛书成为集中发布的18项成果之一，这标志着南粤古驿道工作从实践探索迈向理论建构的新阶段。南粤古驿道是岭南历史的立体缩影，是联结城乡的经济文化纽带，是永不落幕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条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也会在我们的守护下绵延不绝。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